

# 中国看病最不贵, 谁的观念有问题?



【中国观察之椿桦专栏】

在“看病难, 看病贵”的民间共识下, 广州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称“看病最不难最不贵是中国”(《新快报》2月19日), 可谓一语惊人, 它与“高校学费不够贵”、“房价并不高”等“精英话语”具有同样的爆炸效应。

作为广州市政协委员, 曾其毅副局长18日为当前的看病难与看病贵问题“把脉开方”。他表示, 他“走遍全世界”后发现, 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 但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

诊金是数百元。曾副局长认为, 所谓看病难与看病贵, 实乃国人的观念有问题。他为此打了两个比方: “喝一次茶要多少钱? 大家对生命、医疗技术不够尊重, 所以就觉得看病贵, 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 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 这是价值观不对。”

曾副局长的话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在中国, 看一个专家门诊只需区区7块钱, 人人都出得起。但曾副局长说的好像就是“看病”不贵, 而不是“治病”不贵。用一个简单的推理式, 可以将曾副局长的话解读为: 病人挂号最不难最不贵是中国, 在中国只要几块钱就可以挂一个专家号, 在国外却要几百块——我们没有“走遍全世界”的经历, 姑且信之吧!

由于曾副局长打的比方很前卫, 反而使我们发现了“看病难”的新问题。我

们都相信, 喝一次茶的消费可以挂很多次号, 修一次汽车的几千块钱可以挂无数车次号, 但并没有证据表明, 中国病人在挂号时表现得吝啬啊, 他们并没有舍不得修车不舍得修人啊, 怎么会是观念有问题呢? 通过比方, 我们当然知道, 曾副局长主要还是想说明在中国“修”一个病人其实也不贵, 比修一辆汽车便宜多了——救命与修车相比, 多花钱救命才能体现对医疗技术的尊重。

“修”一个病人花费一百多元觉得贵, 修一辆汽车花费几千块钱觉得不贵——不知道这个结论事先是否经过了调查, 但我知道那些“观念有问题”的人们在生病时基本会放弃去酒楼喝茶,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汽车可修。

看病不难、上学不贵、房价不高, 这样的“精英话语”非但不能说明公众的观念有问题, 反倒道出了少

数社会精英的观念有问题——推卸责任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们的精英在与发达国家比较民生消费价格时, 常常习惯于选择性与回避性。例如在比较看病难更贵时, 回避了有些国家的诊金可以管用几个月甚至一年, 回避了国民之间的收入比以及开不起汽车的穷人; 呼吁人们尊重医疗技术时, 回避了我们“以药养医”与“以械养医”的潜规则还没有打破。

当然, 曾副局长也提到, 国外看病是个人、国家和雇主各出一部分, 中国是全部由病人自己出, 所以觉得看病贵。但这正好说明曾副局长的观点是矛盾的——全部费用由患者自行承担而觉得贵, 应当是体制有问题, 怎么会是“观念有问题”呢?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 有时事评论集《舆论尖刀》问世)

# 高官力挺舆论监督, 有点喜出望外



【学者视线之肖余恨专栏】

尽管从道理上说, 舆论监督是媒体以及公众的天然权利, 但在现实中, 舆论监督步履维艰、动辄得咎是不争的事实。近来一些地方政府对媒体舆论监督的态度转变, 却有一点让我们喜出望外的感觉: 江西、广西提出新闻也是生产力、软实力, 广东省领导欢迎网友“灌水”、“拍砖”, 云南明确将媒体监督作为问责行政首长的依据之一, 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17日表示, 真诚地欢迎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各地不约而同, 高调力挺, 表明舆论监督正在成为一些地方推动“善政”的工具。

其中, 我认为, 对媒体监督功能的认识, 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的表达最恳切, 也最有代表性。据2月18日的《人民日报》报道, 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日前在杭州市新闻媒体恳谈会上说, 对于舆论监督, “我们经过了3个阶段: 首先是害怕监督, 如临大敌; 第二阶段是不怕监督, 你说你的, 我干我的; 现在我们认识到, 要办好一件事情, 必须欢迎媒体监督。没有舆论监督, 我们的执政理念不会上升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样的高度, 执政水平也不可能提高得如此之快; 媒体的作用确实非常大, 非常重要。”

王国平从“害怕”、“不怕”到“欢迎”态度的变化, 很有代表性, 是政府部门执政理念成熟的表现。在现有的权力架构中, 政府部门的权力较大, 所受的有

效约束还不算多, 所以, 舆论监督往往能够起到“补缺”的作用。因此, 在当下的中国, 更需要积极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但对一个政府来说, 仅靠自省式的“自知”还远远不够, 必须借助于外力, 让民众的监督凭借媒体这个平台充分发挥作用, 促使政府部门“自知”“自省”“自律”。

应该说, 对舆论监督功能的认识, 很多政府部门不能说不清醒, 但真正遇到监督的时候, 特别是负面新闻影响到“政府形象”和“个人前途”的时候, 态度就可能发生动摇了。所以先是害怕, 后来在封杀不了的时候, 就不为所动、不屑一顾, 架空了舆论监督。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兴起, 民众的表达和监督的路径的多元, 让政府部门觉得, 被动挨批只会让事态恶化, 与其被动挨批, 不如主动欢迎, 让舆论监督的冲击力为提高政府自身建设压力和动力。这不仅仅是换个思路的问题, 更主要的是在敬畏民意基础上的一种自知、自信和自律。

从害怕到不怕, 是一种盲目自大。从不怕到欢迎, 是一种升华。其实, 这本就是一个开明的政府应该采取的态度。如果再进一步, 对于正确的舆论监督, 不是你欢不欢迎的问题, 而是不得不老老实实接受的问题——让法律赋予舆论监督应有的权力, 那就是更高的一种境界了。这一天已经不远了: 2007年3月1日起施行的《浙江省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就专门规定: “新闻媒体依法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和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情况进行舆论监督。”更权威、更明确、更细化、约束范围更广、约束力量更大的法规出台了, 看来也是为时不远的的事情了。(作者系南京政治学院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 可怕的不是“政协委员为利益集团代言”

## 第二落点

这两天广州的几位政协委员可是出了大风头, 先是广州市政协委员、房地产企业扶伟聪在政协经济组分组讨论中炮轰限价房, 说广州的限价房让人重新看到平均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子, 给社会带来了新的不公平, 又影响社会和谐, 应该取消(2月18日《新快报》), 紧接着, 广州市政协委员、市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又称“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 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曾其毅说: “修一个人一百多觉得贵, 修一个机器、换一个汽车零部件要几千块却没人觉得贵, 这是价值观不对。”

(2月19日《新快报》) 毫无悬念, 就像扶伟聪炮轰限价房遭到了舆论一致痛斥一样, 曾其毅称“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也

引来了网友们的一致炮轰。网友们除了批评这两位政协委员的言论罔顾现实、信口开河之外, 更多的还将矛头指向了他们利用政协委员身份在地方两会上为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代言, 试图影响政策的走向。有的网友更表示, 这样的政协委员根本就谈不上为民生谋福利, 应该被终止委员资格。

我很理解网友们对这两位政协委员的出离愤怒, 就我有限的生活经验来看, 我也觉得“限价房影响社会和谐”、“中国看病最不难最不贵”的确是荒谬之论。但这并不代表我认为这两位政协委员说这样的话有多么的离谱, 事实上, 说出这样的话, 的确是符合他们利益集团发言人的身份。

两会本就是各个利益群体代言人进行利益协商的场所, 不管我们承不承认, 每个政协委员事实上都

是代表一定利益集团在两会上发言的。既然有代表购房人和患者的政协委员, 就当然会有代表开发商利益和医疗机构乃至卫生部门利益的政协委员。扶伟聪和曾其毅的“离经叛道”之论固然让人们心里很不痛快, 但他们的发言却符合所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可以说, 从这个方面讲, 他们同样是“尽职尽责”的, 你可以痛批他们的言论, 但却不能说要把他们清除出政协委员队伍。并且, 他们能够冒着被舆论痛斥的风险为利益集团代言, 恰恰体现了广州两会宽容的言论氛围。

有代表开发商和医疗体系利益的政协委员冒天下之大不韪并不可怕, 甚至他们试图影响政策走向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在两会上没有代表利益相对方的政协委员站出来与其展开论

战。倘有足够的利益制衡, 倘有与其针锋相对的政协委员, 那两位政协委员的“高论”也就只是说说而已。但现在, 我们除了看到舆论对他们展开痛批之外, 却看不到代表利益相对方的政协委员站出来与其展开利益谈判。如果批评声仅仅局限于网友和媒体, 无法转化为政协委员在两会上针锋相对的发言, 那么, 人们对那两位政协委员试图左右政策走向的担心也并非多余。

扶伟聪和曾其毅这两位代表强势利益集团政协委员的高调, 与其他委员的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于那两位政协委员“离经叛道”的高论, 这种对比反而是最可怕的。它其实在提醒我们, 政协委员中“官员委员”、“老板委员”比例过高的现象, 已经到了该正视的时候了。(易其峰)

# 请从权利视角看“看病不贵”

## 第三只眼

看病贵不贵, 难不难, 不要从权力的视角, 而要从权利保障的视角加以考察。没有保障的权利, 将公众抛于不确定之中, 这是大家对于医疗恐慌的原因所在, 这并不是简单地从就医价格的对比中可以发现的。副局长将看病贵不贵看成了价值观不同, 仿佛用上阿Q的

精神胜利法“我说你不贵, 你不贵”。那位副局长的发言是从权力的视角看待看病难的问题, 于是难免与“权利觉醒”中的公众的看法相悖。没有保障的权利就不是真正的权利, 公众正是从我国医疗保障不健全而感受到权利实现难的, 一句价不贵的辩解, 其实是无法满足公众对于健康权保障的期待的。

该副局长修车与修人

的比喻很好, 目前我们的窘境是: 车辆有着健全的保险体系, 但个人却没有类似的保险体系, 很多人在医疗中面临着不可预测的风险。而医疗中的风险的关键在于, 一系列产业化的国家政策, 使得人的健康成为别人赚钱的工具, 而不是切实保护的, 人吃五谷谁能不生病, 而这样的病患, 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 足以让中产者

破产, 无产者丧命。权利无保障, 那么再低廉的医疗服务也无法解除人们对于未来的恐慌; 而权利有保障, 再高昂的医疗费用, 人们也能明确自己可以得到什么, 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医疗服务的价格进行技术性的比较,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医疗体系中, 人居于何种位置? 国家给个人以什么样的呵护? (邹云翔)

# CPI创新高不能全归咎于雪灾

## 热点纵论

新华网2月19日电: 据国家统计局19日发布的最新统计, 受春节和雪灾等因素影响, 今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7.1%, 创1997年以来月度新高。年12月上涨1.2%。

雪灾给2008年中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毋庸置疑, 数以百亿计的直接经济

损失, 以及政府与民众为灾后重建需要耗费的巨大人力物力, 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基础资源供应的紧张。

但我们也应看到, CPI同比涨幅创1997年以来月度新高, 也不能排除“非天气因素”。实际上, 早在年前, 牛奶、餐饮等多个食品生产及零售行业就已放出风声, 扬言要在2008年打响行业集体涨价的第一炮。

因此, 对于各涨价领域, 尤其是上涨幅度较大的行业, 我建议政府尽快展开全面而系统的摸底调查, 首先搞清楚该领域价格上涨究竟是纯粹的灾后和节后效应, 还是近年来资源供应紧张所引发持续上涨的又一信号? 如果其中有人为因素, 那么是个别企业的自发行为还是价格联盟坐地起价? 在各类价格上涨中, 哪

些是不可抗拒的天气因素或成本上升因素, 那些是可控的技术性因素?

尤其是针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几大国有垄断行业, 比如水电气, 政府除了进行内部调查外, 还应聘请具有独立性的第三方机构专业监督, 对其涨价惯用的“成本论”深入透析, 防止价格上涨的“搭便车”行为泛滥。(毕定国)

## 【2月19日读者挑刺】

1: 读者王先生等: 2月19日A28版《耗资200亿! 横店重建圆明园》导语第三

行中“圆明园毁于‘八国联军’大火之下”应为“圆明园毁于‘英法联军’大火之下”。(记者: 李谷, 编辑: 曹锋)

2: 读者吴先生等: 2月19日A36版《在嘘声中 小

皇帝赢得MVP》第二段第二行中“以27分全场最高得分”应为“以27分”。(编辑: 袁震)

3: 读者汪先生等: 2月19日A16版《美夫如同年同

月同日生 同年同月同日死》第一段第五行中“结婚43岁”应为“结婚43年”。(编辑: 谢卫东, 校对: 姜震宇) 快报向广大读者致歉, 欢迎挑刺, 电话: 96060。

# 没人听的领导电话公布干吗?

## 公民发言

16日, 《昆明日报》公布了从市委书记、市长到市直各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联系电话, 同时详细刊登了领导的职务分工情况。昨日, 记者在上午10点40分至中午12点, 下午4点至5点20分这两个时段, 拨打了昆明市有关部门35个副局长的电话, 结果有13名副局长接听电话, 其余22名副局长的电话无人接听。

(2月19日《都市时报》) 我不知道昆明的老百姓闻听这个事实后会产何种感受, 但假如我是昆明市民, 就会产生一种受欺骗、遭忽悠的感觉。不是吗? 为了体现公布领导联系电话以及职务分工情况的作用, 体现接受群众监督的诚意, 昆明有关方面大肆渲染。可真正到了有关方面接受监督和听取老百姓心声的时候, 这些电话大多数却成“哑巴”了, 并且还是在决策刚刚执行阶段, 如此形同虚设的“花瓶”摆出来

有何用?

这样的电话, 别说是公布几百部, 就是公布了几千部乃至几万部, 对老百姓直接反映问题和进行监督也起不到实质性作用。这么多的监督电话成“哑巴”, 损失的不仅是老百姓自身利益, 还有政府和官员的形象。我们知道, 现代政府和官员的承诺、态度等, 早已不是可有可无的儿戏, 而是一块试金石, 它直接检验着政府和官员的诚信、执政为民的决心等等。公布出的领导电话成为了“哑巴”, 政府和官员的形象何言?

让那些“哑巴”电话必须开口说话, 发出声音, 体现它存在的价值和作用, 建立责任追究制, 这是当务之急。据了解, 有政府官员在自己的办公电话号码公布后, 为了不错过接听群众打来的电话, 他已经把办公室电话绑定在手机上了, 24小时开机。笔者以为, 这种做法值得肯定, 更值得那些哑巴电话的主人学习和借鉴。(陈光明)

# “爹不如人”取代“技不如人”?

## 公民发言

2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 共青团中央学校部、北京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联合发布的“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 有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的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在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中, 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1.29%。

可以说, “父亲就业时代”的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 这个魔盒之门, 就是漠视起点公平。在很多问题的起点上, 我们放任了不公平现象的存

在而不自知, 最终酿成了“父亲就业时代”的恶果。一些人从小可以上天价幼儿园, 一些人根本没有接受早教的条件; 一些人中小学可以择校进优质学校, 一些人书读就不错了。从一开始, “爹”是否有权, 就把受教育公平打破。再往后, 人们进入了工作单位特别是体制内单位后, 比较的是工作能力吗? 是权者通吃, 有钱者通吃, 有关系者通吃……人与人的公平就被逐渐吃掉。要关闭“父亲就业时代”这个潘多拉魔盒, 唯一的办法就是, 也只能是从起点公平做起。(李辉)